

(一)1945 年后三个月

小 引

这一年，我写的只是三个月的故事，内容一看便知。

45·06 山头会议

七大之前的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只总结了抗战以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李立三、王明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但是到 1945 年七中全会通过这个决议的时候，抗战已经八年了。毛泽东在七大之后，提出要总结抗战时期历史经验的建议。为此 提出先按各“山头”开会 回忆与研究抗战时期党的工作状况，为总结抗战后党的历史经验作准备。

各个根据地的山头会议开得比较大。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时，说彭德怀在一个会议上“骂娘”。我一听就明白，毛泽东说的那个会议就是我知道的山头会议中的彭德怀那个根据地的山头会议。

要我参加的山头会议有三个。一是“一二·九山头”。“一二·九”虽然发生在抗战以前，但是“一二·九”运动一直延续到抗战爆发。在抗战爆发之后，“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也可以算做一个小小的山头。这个山头的山头会议是在中央青委举行的。但是抗战之后，“一二·九”毕竟算不上一个实体，算不上一个“山头”，只开了一两次会就没有多少话可说了。

二是“湖北山头”。抗战后我在武汉工作了一年，从1934年秋到1937年秋做过武汉临工委的委员、湖北省工委农委的委员、长江局青委书记和委员。经过延安整风，自己的认识提高后，回头看，认为王明、董老之间存在不同的指导思想，而且对这不同的指导思想产生的后果也了解了一些。比如王明，他把希望过多地寄托在同蒋介石搞好统一战线上，用过多的力量去做上层工作，而对在农村中建立党的基础、准备打游击战争不予重视，对国民党同我们的斗争的警惕性不够等等，对武汉、湖北乃至在整个长江局领导的范围内的各个地区造成许多恶果。在会议上，我讲起郭妙春的事情。她是武昌的一个女中学生，武汉青年救国团的积极分子，后来加入了党。在武汉沦陷后，她同一些同志从武汉去鄂东地区，那时候他们得到了若干支枪，由于缺少警惕性，枪支不是扛在肩膀上，也不

是拿在手上 而是把枪捆起来 两个人抬着枪走。也没有学点射击技术 结果想得到这些枪支的人眼红 把她杀害了 枪支也被抢走。我也回忆了贵州民先队员张益珊被贵州当地反动派杀害的事例。我们在山头会议上就讲了董老（他是湖北省委书记）特别重视在农村中打游击的指导思想，减少了王明路线的有害影响。并且指出，如果不是王明的错误指导思想，在当时利用武汉的有利形势 动员更多的人到农村去 对以后湖北省的武装斗争会有利得多。

武汉山头会议有几次是在中央党校开的。我得到通知时说 这个会议由钱瑛大姐主持。我在湖北省农委工作时 钱瑛大姐是组织部长。我第一次去中央党校找钱大姐，结果找到了另一位参加辽宁山头会议的钱大姐，因此我多认识了一个钱大姐。

三是“广东山头”。1938年到1939年我在广东省委做过将近一年的工作，包括广州沦陷前在粤北翁源和韶关的工作，对于广东省委这段历史也有一定的了解，但是终究不如在武汉时那么深，我认为这个时期广东省委的书记张文彬工作问题并不大。

山头会议还在开，就得到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特大喜讯。抗日战争胜利了，传来毛泽东的一句话：山头会议不要开了，大家赶快准备离开延安，出去抢桃子吧！这个山头会议就不了了之了。

45·07 在延安我活动的“四至”

快离开延安了 我曾想到 我在延安时最远都到过什么地方 即我活动范围的‘四至’是什么。所谓‘四至’就是东南西北 我最远都到过什么地方。

在延安 我活动的‘四至’和在陕甘宁边区的‘四至’不是一个概念。在延安我活动的“四至”，只包括延安市和延安县。我只写延安的‘四至’不是写陕甘宁边区的‘四至’。如果写陕甘宁边区的“四至”，1939年我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到延安 就经过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地区 看见过关中的源地 它同延安地区的丘陵不一样。要说陕甘宁边区的‘四至’最南就是关中地区。最北我到过绥德地区 离开延安到张家口 就是在葭 县过黄河 到山西临县的。我还到过延属地区的安塞 那就是和狼见面的地方 属于东北方向的‘一至’。我没去过三边地区 也没有去过陇东地区 这就是说陕甘宁边区没有去过“甘”和“宁” 只去过“陕”一个地方。

现在我讲我在延安的‘四至’。假如只说延安市 最北是到过蓝家坪北的中央医院。中央医院的院长何穆是个肺病专家。我到中央医院是因为自己觉得老是神经衰弱。在自然科学学会工作时，我认识了何穆院长——解放后他在通县一个肺病专科医院里当院长。一天我去了中央医院，背了一个大背包 在门口挂号 管挂号的人问“病人是谁”我说“就是我”。管挂号的人见我这样背着大包，十分诧异。那时没有查出什

么病，我的收获就是到了延安市最北的地方。我还到保育院看过吴学毅。但我弄不清楚那个地方究竟是在中央医院的南边还是北边。

最西大概就是杜甫川了，这里说的是西南方向。西北方向也许可以说是去过枣园。最南涉及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到延安的问题。最东就是到过桥儿沟，我去过的柳树沟已经属于延安县，不属于延安市了。

我还到过地方就是龙儿沟，我到那里去过两次，我想它也不会是属于延安市的，到那里我们是两条腿走去的，有比较远的感觉。但是它到底在哪里？东南西北，一点也说不清楚。

总起来说，我在延安期间活动的范围实在太狭窄了。

45·08 从延安到张家口

再见吧 延安！

我在陕甘宁边区呆了六年又好几个月，除了走了一趟绥米之外，一直都住在延安市。在延安 尽管挨过整，住过特别班，对有些社会现象也看不惯，但靠自己的那个“革命阿 Q 主义”，过得还是愉快的。在这些年中一直盼望抗日战争的胜利，战争已经八年了，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党的力量在不断增长，解放区在不断扩大，但毕竟还在农村，而延安、陕甘宁边区的天地也毕竟太小了。看到延安人一队一队离开延安，出去“摘桃子”，朋友们一个一个地向我告别，明知快轮到自己

了，还真有些坐不住了。11月底，终于盼来了我们延安大学也要前去东北解放区的消息。延安可爱，但在广阔的土地开展工作更有吸引力。再见吧，延安！

在12月初的某一天我们开拔了。

张家口是1945年8月下旬解放的，是华北第一个解放的城市。从延安到张家口没有交通工具，我们只能步行到那里。因此整个延安大学组成一个行军大队。行政学院、鲁迅艺术学院和自然科学学院，各组成一个中队。三个中队之外还有一个由周扬一家、张如心一家、何干之一家和校部的人组成的一个大队的直属队。我是大队秘书兼直属队队长。不过其他三个中队并不走在一起，基本上我没有管。我这个大队秘书是虚的，直属队长的工作才是实的。直属队人数少，但有年纪比较大一点、身体弱一点的，有大人也有几个小孩子，需要比较多的照顾，条件也会好一点。特别是队伍快出发时，自然科学学院中队提出，自然科学学院有一些年纪很轻的女同志跟着他们的中队走，可能比较吃力，可否到直属队来。大队长周扬同意了。我这个直属队长的队伍因此又扩充了七八个队员。其中就有我现在的老伴孟秀英，现在改名孟苏。

先介绍一下一路的基本情况。从延安到张家口，每隔几十里设立一个兵站，负责帮助过路的人顺利完成“行军”的任务。这些兵站把过路的人住的、吃的地方都事先安排好。第二天一清早，大家按时起床，简单地盥洗完毕，这时兵站事先已经动员好的当地老乡带着自己的大牲口就来了。每个大牲口都负有一个可以捆铺盖卷的木架。这时候大家把铺盖交给

老乡 老乡就把铺盖捆到木架上去 然后大队人马就出发。中午大队人马和老乡在事先安排好的地方吃一顿饭，略事休息就接着走 到傍晚就到了下一个兵站 把铺盖卸下来老乡就回去了。我们又在事先安排好的地方吃晚饭 过夜 第二天把前一天的活动方式再重复进行一遍，去第二个兵站。因为行军的队伍多了，兵站的这项工作组织得很好，我们从延安出发，一天一天都这么过日子，每走一站我们就离张家口更近了一站。

直属队人少 但是事先给兵站打招呼要的牲口多 它的条件比别的中队优越。除周扬和苏灵扬，张如心和何锋两对夫妇以及何干之夫妇一直都配了坐骑外 还多要了两头牲口 准备给走不动的人坐。我身体很好，那时我才过三十岁，很强壮，根本没有想骑什么马，我对我自己的两条腿有很大的信心。

没有想到 上路的第一天我就把脚崴了 崴是陕北话 指的是脚背上的肌肉因为没有走好，受了伤。原因是我不注意路不平的情况，老是在一侧倾斜的路面上走。第二天我又坚持走了一天 第三天就实在不能走了 当时还没有出陕甘宁边区，我不得不占用了准备给别人用的坐骑。我本来是照顾别人的人 却变成了受照顾的人。周扬、张如心等人的坐骑是兵站配的，我保证他们坐的是马，可是我自己骑的可真热闹了。马、骡、驴、牛 还有骆驼都骑过 只是没有骑象和鸵鸟 在全国都没有这样的坐骑，更不要说在陕北和晋西北了。

“马背哪有牛背稳”。可是走起路来牛可真慢。它就是

个慢性子。自然科学院来的同学就一下一下地抽打这头牛，但它还是稳如泰山般慢慢地行进。于是我就像张果老那样倒骑着牛，在牛背上给她们说话。其实这些年轻的女同志很会走也挺能走。自然科学院中队负责人说怕她们走不动完全是多余的。

当我不得不坐在牛背上的时候，她们却迈着轻快的步伐，挥着树枝，驱动我的坐骑。跟着我们这个直属队走的自然科学院的同学她们的名字我都还记得 谢巧华、席小三、王秋玉、赵凯、陈平、陈平中(她们是姊妹俩 陈平是姐姐 陈平中是妹妹)还有一个现在是我的夫人孟苏。一起走了几天 我看到她们都很能吃苦耐劳，但是我还是想使她们少注意些走这么长的路的疲劳。我没有别的本事 就只有给她们讲故事 古代的、现代的、编造的、真实的、亲身经历的、别人讲给我听的、有教育意义的、没有教育意义的、好笑的、并不怎么好笑的……都讲给她们听。不过路实在太长了 讲到最后 快发生故事枯竭的危机了，旅途也快结束了。

那些女同学身边带的东西中有一种自制的产品，大概是以前别人从来没有用过的，里面絮着棉花的面罩。用上它面部就不怕冷了。当然走路不能不看路，所以在面罩上留下两个窟窿。她们说这是在延安时听人说这次行军是在冬季，在路上会遇到很冷的地方，会用得着这个东西。看了这个东西，就让她们戴着给我看看，觉得真滑稽。不过这是实用的东西，美观是不重要的。大家都还是带在身边了。

一路上 天并不那么冷 她们都没有用。延安到张家口每

个兵站相隔都只有几十里（这是为我们这样慢行军的人安排的，如果有的队伍愿意强行军，可以一天走两个兵站）我们早上出发得不特别早，到下一个兵站的时间也不特别晚，没有遇到寒风刺骨的情况。只是到左云这一天，路程特别长，天色也完全黑了，我们还在路上，而且也刮起风来了。我提醒她们，这面具你们带了一路，为什么现在不拿出来试试。真的，她们把这东西罩在脸上，好在夜间路上没有其他行人，如对面来人，见到这样一副面孔，会有什么反应？也许会吓一大跳。走了一段路，我问她们，这东西有用没有，她们一齐回答“管用”。有一个女同学把它摘了下来，让我试试，我就戴在自己脸上，真的舒服不少。

那一晚真冷，我穿着棉袄棉裤，就好像什么都没有穿，光着屁股那样，风直往衣服里面钻。这时候我明白了穿皮子衣服的意义。皮挡风的性能，要比棉花好得多。

那次，几乎每到一个兵站，我都会丢掉一件小东西。丢三落四是我的老毛病，但在这一次得到了集中的表现。人家笑我，我说就算是在每个兵站都留个纪念品给当地人吧。不过那时我实在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可丢。

没有想到，到了阳高可以上火车到张家口。这完全是出乎意料的事情。有了这样一件好事，可以少走两天路。少走这两天路，意义重大。它意味着可以在1945年年底以前赶到张家口，否则元旦还会在路上过。

我们坐的是闷罐车，没有一个窗户，本来是装行李的。坐在里面，外面的景象一点也看不见。车晃得厉害，但是大家都

有说不出的高兴。有的人说，这些年我们的同志对铁路线都是横着穿过去的，可是现在是在铁路上直着向前进。大家回顾坐火车的历史 坐过各种火车 惟独没有坐过我们共产党自己的火车。

张家口，我们华北解放区第一个解放的大城市，终于到了。多少年我们都在农村，因此看到其实只是中等城市的张家口 就仿佛到了世界的大都会。房子高大 道路宽阔 城市的灯光在我们面前大放光明。

中国也正在大放光明。

(二)1946 年

小 引

这一部分主要写上半年我参加办北平《解放》的故事，讲得很集中。下半年写的回张家口和重返延安的那些故事，就比较零散了。

46·01 从张家口到北平

我们离开延安的时候，知道自己的目的是东北解放区。没有想到到了张家口之后，所说到东北解放区的路不太好走，要我们在张家口等待。更没想到当我还在路上的时候，中央组织部已经决定分配我去北平办报，电报已经打到张家口等我了。周扬到张家口第一件事就是去晋察冀中央局报告我们这个大队已经到达了张家口。他从中央局带回两个消

息，一个是从张家口到东北解放区的道路有阻，还有一条是中央决定我立即去北平办一张报纸。周扬只是口头通知了我，并没有让我看调令。我问周扬党组织要我在北平参加办的报纸究竟是什么样的，要我去北平做什么样的工作，办报的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人。周扬说这些中央局的人也不知道，他们只收到一个调令。我一想在张家口既然没有人可以问，也就不必问，到了北平，见到那儿的党组织就都明白了。周扬告诉我，中央局的同志告诉他，我到北平后要到军调部我们方面的委员叶剑英那里报到和请示。他们住在北京饭店，军调部有一位李克农，是叶剑英的助手，帮助叶剑英处理日常工作。

于是，我立刻做准备。在做准备时，有一条我倒想到了：我想去北平开展工作，如果有一些可靠的、有用的社会关系，是一定会有好处的。我曾经在北平住过十来年，我的舅父舅母和好几个表弟表妹抗战后一直没有离开北平。他们和我一直很亲近，是很可靠的社会关系。在这城市中还有一些老师和同学，除这些人之外，我还想在北平多找一些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短时间内我找到两个，一个是延安自然科学学院的教员聂春荣，他说自己有个表弟在前门外打磨厂的一个字号里当掌柜，姓孟。还有一个是张家口化工研究所的研究员苏子衡，他是台湾人，解放后是我们台盟的负责人。他在北京有家，准备让他的妻子回北平走一趟，处理一下家里的财产，然后就回张家口。他的妻子当时正在北平，就住在西单的一条胡同里，她的名字叫甘莹。

我在张家口只停留了两三天，就坐飞机去了北平。这是

我第一次坐飞机，我坐的飞机很小，是军调部的军用飞机，面对面的凳子可以坐八个人，那天党的方面坐飞机的共三个人，除我之外，记得的还有伍云甫。三个人到齐后，很久很久飞机不起飞，说还有上飞机的。等了半天，上飞机的人来了，原来是三具国民党方面翻车死掉的报务员的尸体。我第一次坐飞机是同死人一起升天的。

那天飞机飞过八达岭的时候，颠簸得很厉害，我的耳朵很痛，过去我不知道坐飞机有耳痛的问题。

我到北平的时间是 1946 年 1 月 4 日。

46·02 李克农和我的一次谈话

到北平西苑机场后，军调部我方的同志把我接到北京饭店——三方总部的所在地。我一到，马上见到了李克农。抗战初期我在武汉见过李克农，但是以后同他再没有见面的机会。在延安时我只知道他在社会部工作，虽然多年不见，这次在北平我还能一下子把他认出来。他圆圆的脸，不高的个子，唇上蓄有小胡子。那天他一见我很高兴，那会儿似乎也不忙，从从容容又兴致勃勃地给我讲了一大篇话。

这篇话的大意，我一直记得很清楚。他先对我讲了一通办这张报纸的意义。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中央政府从重庆搬回南京。南京是以国民党为主的全国性政治中心。我们党在南京要做许多工作，我们党办的《新华日报》也要从重庆搬到南京。同时，日本投降后我们党中央也不能一直待在延安，也要

搬出来。党中央很可能搬到北平来。北平虽然同延安不一样 不是解放区 我们也不能把国民党的势力统统赶出去 但是城外四周围都是解放区 城里我们党的力量现在就很强 党中央搬来后，我们在北平就会占绝对优势。北平就会成为以我们党为主的另一个全国政治中心。那时延安的《解放日报》也就会搬到北平来编辑发行。你们来办这张报纸就是为延安《解放日报》搬到北平来办做准备的。因此这张报纸也不用另外起新的名称 报头也就用延安《解放日报》的那几个毛主席写的字。你们现在好好工作 将来延安《解放日报》搬来时，一切就都现成。

听了李克农的这些话，我对办这张报纸的意义和它的前途非常清楚，情绪也非常兴奋。以后形势的发展并非如李克农所说的那样。我们 1946 年在北平要办的那张报纸 后来被国民党北平反动当局查封了，没有能够办下去。具体情况下面我还要详细讲。1949 年我们进城以后 也办过一个《北平解放报》。这份《北平解放报》我还买到过一份合订本。人们很容易把它和我们的报纸弄混。因此需要特别说明。它同李克农说的《解放日报》不是一回事 而且后来代替延安《解放日报》的 也不是李克农说的《解放日报》 而是原来在晋冀鲁豫的《人民日报》。这个《人民日报》现在还在办。它在北平开始发行的时候 是当时的《北平解放报》和晋冀鲁豫的《人民日报》合并而成的 即《人民日报》要搬到北平的时候 这张《北平解放报》就停刊了。

那么李克农讲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李克农对我讲这一篇话的时候，即 1946 年初 党中央有一个“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提法。在日本投降之后，有一个短的时间，我们和蒋介石还没有撕破脸。这时候中国人民，乃至许多外国人都希望中国实现和平，不再发生内战。我们应该顾及他们的情绪。而且我们当时也只是说有这种可能性，争取使这样一种可能性转化成现实性，并没有丧失警惕，一刻也没有放松战争的准备。我们一直强调要以斗争去争取和平。后来形势明朗了，和平民主的局面不可能实现，国民党蒋介石一定要打内战。但在 1945 年 12 月底到 1946 年 1 月初，那样想一想、说一说，我认为并非不能允许。即使以后没有出现和平民主的局面，延安《解放日报》在停战协定生效后所写的《和平实现了》这样的评论，表达对和平的一种热望，讲一些代表中国大多数居民的心愿的话，应该说是正确的。历史证明事实正是如此。

在 1946 年初，利用当时的条件，党中央在北平创办了这样一张报纸，意义的确十分重大。

李克农给我讲的这段话的意思，以后没有再从任何方面听说过。不论正式的传达或非正式的谈话中都再没有听说过。我自己当时除了对姜君辰讲过之外，也没有再对谁传达过。我也不知道报社的其他负责同志是否听到过这样的意思的话。说来奇怪，对党为什么要办这张报，我们这张报纸的前景如何，报社内竟没有议论过。

我们这张报纸的名称、报头，后来完全是按照李克农对我说的那样做的。报社的总编辑钱俊瑞是 3 月间到职的，那时